

自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執政黨和國家整治腐敗的舉措，其雷霆萬鈞之勢可謂前所未有，其震懾人心之效雖無法與朱元璋的「剝皮充草」相比，卻也足以顛動九州。可是，即便朱家之法之嚴酷舉世無雙，亦未能阻止大明江山之傾塌。歷史將如何昭示神州，清平世界應以何種制度構建？敬請海內外大家論之。

——編者

「佔中」僅屬政治問題？

縱觀陳方正的〈香港往何處去？——一個香港中國人看「佔中」〉（《二十一世紀》2015年2月號）全文，以立場論顯然傾向建制，這可見諸他多番申明《基本法》已保證了香港人參與政治的權利，輕輕帶過人大釋法對香港政治環境的現實影響，以及香港人由此產生中央威權介入的焦慮。不過，陳先生未有囿於自身立場，對「反對派」和政府均有所批評，並提供解決建議。這於論政必先講立場、社會內部深刻分裂的氛圍下，實屬難能可貴。

這篇文章回顧「佔中」的事件經過、支持者與反對者分別動員的行動，以及民意調查資料，認為香港社會內部正經歷深刻分裂。作者認為究其根本是政治問題，可由政治解決；這亦是他多番提及《基本法》的原因：香港人早獲保證有資格介入公共政策。然而，這說法未有顧及「佔中」已不只是政治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問題，而是文化甚至是世代問題。作者引用的民調沒有告訴人們，到底反「佔中」者反對的是「佔中」，還是追求民主普選。換句話說，是怎樣衡量經濟價值和普世價值的先後順位問題。

既得利益者自然不希望「佔中」影響社會經濟。相反，參與「佔中」的人，訴諸的是一時的不便或經濟犧牲，以換來更重要的價值。價值順位差異，反映了思考範式的轉變，追求民主而不是但求三餐溫飽成為某些人想得較多的問題。作者認為很多香港人的政治取向是相當現實和保守的，不認同急劇改變，因為他們都珍惜既有的繁榮與安居樂業。這種看法大概無法為參與「佔中」者所認同。

當爭取民主成為這一批人較為重視的價值時，他們又看着普選承諾由2007年起不斷推延，實在很難找到合理理由使他們信任《基本法》——準確點說，是詮釋《基本法》的特區政府或中央——的「保證」。作者指香港作為中國的「民主『實驗室』」的講法，似乎尚需要更多論證。

黎國威 香港
2015.3.7

「雨傘運動」之後

2014年下半年香港爆發的「雨傘運動」舉世矚目。連不遠萬里的加拿大，當地電視台都有配以港人氣衝雲霄的抗議聲浪的報導。素以「經濟人」著稱的港人，這次究竟是怎麼回事？

鄭焯、袁瑋熙的〈「雨傘運動」：中國邊陲的抗爭政治〉（《二十一世紀》2015年2月號）及時地提供了對這一運動的成因、規模、形式和影響的初步探討，認為「雨傘運動」不純粹是政治團體的操作或社會怨氣的爆發，而是基於中港「一國兩制」的深層矛盾，而且運動形式出現了不同於傳統範式的「去中心」、無劇本、多樣化，以及「雨傘一代」的集結。

作者指出，香港的抗爭者普遍拒絕接受政府給予的小恩小惠，而着眼於徹底的社會改革和民主政制；但北京認為不論港人如何反彈，也要宣示主權，以強硬手段迫使人心回歸。其實，這既是「雨傘運動」的起因，也是未來的一個不祥之兆。文章最後呼籲當權者需要意識到這一矛盾。這也讓人想到坊間「中港區隔」、「民主恩賜」的議論。

當然，如果統治階級在香港作出讓步而使民主得以實現，那是改革成本最小、社會進步最大的選項。中國人在經過了上一個世紀的革命、戰亂、鬥爭之後，是否可以在繼承了完善英式法治的香港走出一條政治新路，現在還看不出迹象；將來怎麼樣也難以預測。而這正是海內外華人關心、企望之所在。

梁加農 加拿大
2015.3.6

「六七暴動」改變了甚麼？

「六七暴動」是香港近現代歷史上一場影響深遠的運動，可以說它大大改變了香港的社會心理結構和政治力量對比。中國大陸發生文化大革命之後，香港激進左派乘機奪取權力，繼而打算「解放」香港。激進左派的武器分別是「一支筆」和「一杆槍」，而在「六七暴動」中，香港當局不僅成功平息了動亂，還在左派所擅長的文宣戰中取得了壓倒性的勝利。

許崇德的〈攻心為上：香港政府應對「六七暴動」的文宣策略〉（《二十一世紀》2015年2月號）這篇文章，通過對檔案資料的整理，很好地為讀者展示了香港當局應對文宣戰的策略和方法。1967年，香港當局運用各種宣傳策略穩定民心，提振執法力量士氣，最後成功平息動亂。1968年之後，香港當局利用社會各界對激進暴力行為的不滿，順水推舟，持續抹黑左派形象，將之與「恐怖主義」等掛鉤，成功塑造了香港社會的「恐左」情緒，從此，香港左派不僅失去了社會上層和知識精英的支持，更在普通

市民的心中留下了十分負面的形象。

「洗腦贏心」(winning hearts and minds) 是英國殖民政府在鎮壓東南亞殖民地獨立運動時得出的一整套經驗策略，許崇德的文章告訴我們，實際上「洗腦」並不是這麼容易，關鍵在於「贏心」。左派的文宣工作在香港開展多年，雖有所效果，但當他們刻意擾亂社會秩序、破壞法制，甚至使香港市民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脅時，就被毫不留情地拋棄了。香港當局只是精準地抓住了這一點，展開全力反擊，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作者稱之為「攻心為上」。

應該看到的是，香港當局在「六七暴動」之後持續對「左派」、「共產主義」等進行負面宣傳，使得香港社會對中國大陸政府和社會制度的不信任感根深蒂固，這一問題在2014年爆發的「佔領中環」運動中體現得淋漓盡致。怎樣破解這一難題，還需香港和中國大陸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

吳盛傑 南京
2015.3.8

操千曲而後曉聲

張健的〈香港社會政治覺醒的動因：階級關係、參政需求、族群認同〉（《二十一世紀》2015年2月號）一文，是作者在把握民主政治理論和深入了解香港社會現實基礎上，對香港社會當前面臨的重大政治問題所做的評述和闡釋，具有整合思想、啟悟民智的功效。

在「香港的『階級革命』」一節中，作者秉承「無限的過去都以現在為歸宿，無限的未來都以現在為淵源」的信條，

把現實置於歷史背景下審視衡量，合乎邏輯地推演出「香港的階級政治發展落後於其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的情況將要結束，佔人口多數的人們反對佔人口少數的統治精英的態勢，是政治民主化的最大推動力」這一結論。

在「香港的『民主革命』」一節中，作者對最能代表當今時代標識和走勢的民主政治進行鋪陳和闡釋，通過釐清香港民主建設的傳承與流變，考察了港人民意識勃興的社會經濟基礎，指出「香港泛民主勢力是在進行史無前例的政治實驗甚或政治探險」，並從學理層面表明，香港民主政治的發展將是漸進溫和而非激進。

在「香港的『民族革命』」一節中，作者多視點地呈現香港政治亂象的歷史成因，特別是認同因素，並提出「即將瓜熟蒂落、馬上水到渠成的『港獨』，或許也很難被排除在未來香港建制外政治勢力及其支持者的選項之外」。對於認同問題膨脹可能引發的政治社會問題，作者流露出來的擔憂不無道理。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使用的「民族革命」之類的表述，只不過是一個類比，而並非認為香港存在着民族學意義的民族問題。

在最後的結語部分，作者闡明了「中港雙方最大的差異是人民所享有的自由」這一觀點，並提出「香港之於中國政治在未來更重要的一個功能或許是作為一個『劇場』」。這一識見，非無稽之談。

劉金祥 哈爾濱
2015.3.8